



从壁垒到引擎：“第28个制度”与欧洲制造的未来

伊莎贝尔·施纳贝尔

摘要 欧洲虽常被贴上“暮气沉沉”的标签，实则拥有全球领先的生活品质、健全的制度体系与社会保障。当前欧洲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缺乏人才或创意，而是规模不足。单一市场因内部监管与行政壁垒而碎片化，导致企业难以跨境扩张，创新成果外流。南欧国家通过结构性改革已实现强劲复苏，而德国则因内需长期疲软、投资外流陷入增长停滞。为此，“第28个制度”提出创建统一的欧盟法律框架，供企业自愿选择，以降低跨境经营成本，便利融资与规模化发展。该制度若能落地，将释放单一市场潜力，助力打造“欧洲制造”品牌，提升生产率，增强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

关键词 欧洲经济 单一市场 第28个制度

当前，我们身处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调整，数十年来主导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地缘安全的既有规则正被全面重塑。

在这日益分化的世界，欧洲却常常被贴上“暮气沉沉的大陆”的标签，既受到地缘政治对手的挤压，又被过度监管所束缚，更难以跟上技术快速变革的步伐。这种论调看似颇具吸引力，实则一叶障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欧洲依然位居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之列，其根基在于强大的制度体系、坚实的社会保障以及危机来临时非凡的应对能力。以此为基石，欧洲完全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使欧洲再次振兴的关键在于充分释放单一市场的全部潜力，这是欧洲最强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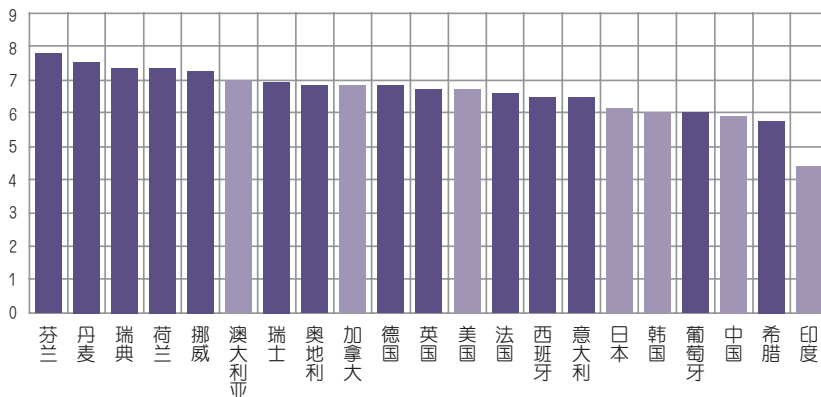
资产之一。借助这一资产，方能弥补欧洲今天最缺的一环：不是人才，不是创意，也不是研究，而是规模。

在这方面，“第28个制度”将成为真正颠覆游戏规则的重要举措，并为企业打开无缝对接整个欧洲市场的大门，提供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规模。借助这一规模，欧洲将能够以“1个经济体”而非“27个经济体”的身份参与全球竞争，并有助于创造欧洲长久以来缺失的东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制造”品牌。

无论是生活品质还是民主价值观，欧洲均位居世界前列

欧洲之所以能在全全球独树一帜，在于其卓越的生活品质，而生活品质又依托于

伊莎贝尔·施纳贝尔 (Isabel Schnabel)，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本文根据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在维也纳奥地利科学院纪念欧根·冯·伯姆—巴韦尔克讲座上的演讲整理，原文出自<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6/html/ecb.sp260211~2822ae9612.en.html>。谢华军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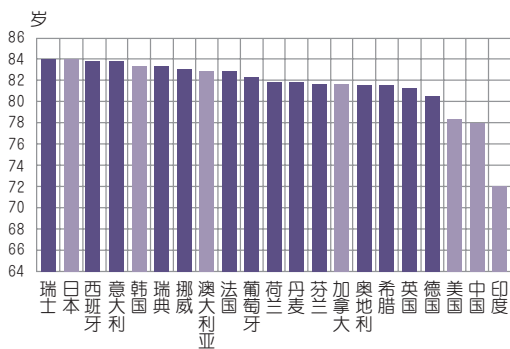


注：打分区间为 0 至 10 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深色代表欧洲国家。

数据来源：Wellbeing Research Centre(2025), Our World in Data.

图 1 世界主要国家生活满意度调查自评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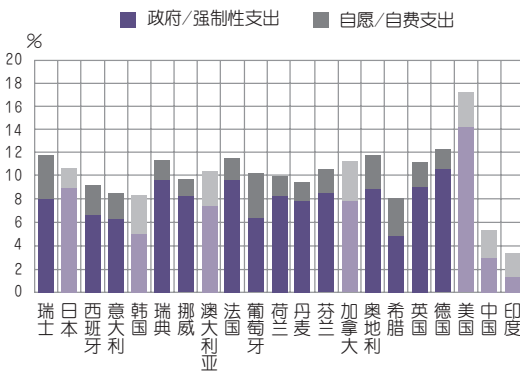
2023年出生时预期寿命



注：深色代表欧洲国家。

数据来源：WDI。

2024年卫生支出占GDP比重



注：深紫色/深灰色代表欧洲国家。

数据来源：OECD 2025 年健康统计数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全球卫生支出数据库。

图 2 世界主要国家预期寿命和卫生支出比重

强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基础。欧洲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始终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图 1)。这种成就超越了单纯的收入或财富增长，指向一种更为本质的成功，即创

造了让人们能够真正安全、充实且繁荣地生活所必需的条件。^①

健全的社会保护、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和有力的家庭支持，

① 欧洲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机会平等。例如，较低的学费和多样的公共资助，使个人教育成就较少受家庭收入的影响，由此缩小了早期生活境况对人生成长轨迹的决定作用，也让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可行。



有助于将更多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们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健康状况在这方面尤其能说明问题。尽管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是出生在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孩子，其预期寿命比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多出五年以上（图 2）。即使是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其死亡率也仅与欧洲部分地区最贫困人口死亡率相当（Machado et al., 2025）。

跨大西洋繁荣差距再思考：从更多闲暇与更大平等中探寻答案

纵观历史，欧洲一直在为其理想的社会形态做出自主选择，但这种选择也付出了代价：在收获更好生活品质的同时，压低了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 GDP，该指标是衡量经济繁荣程度最常用的指标之一。按照该指标，欧元区排名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图 3）。^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原因在于东欧等欧元区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收入水平尚未达到欧元区均值，从而在统计数据上拉低了整体水平。然而，即使是较发达的欧元区经济体，与美国也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Darvas,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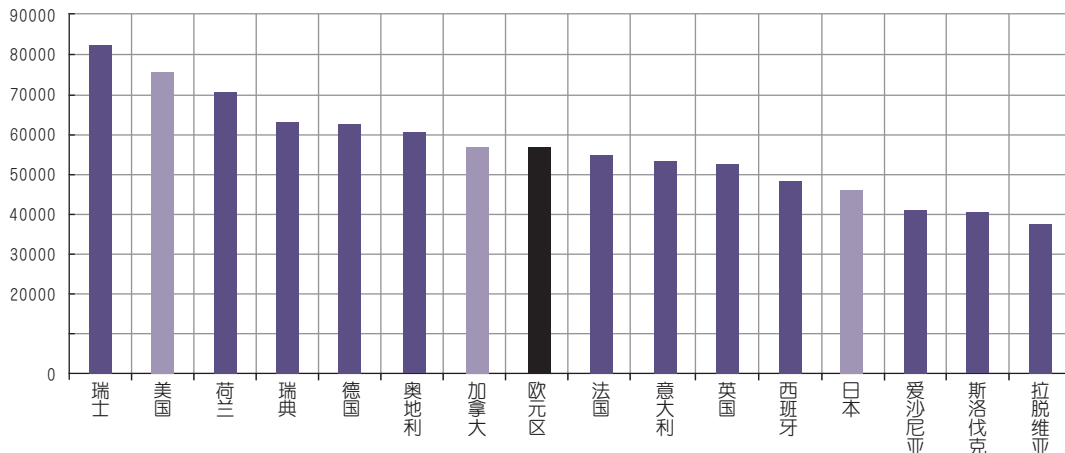
第一，工作时长较少，而非工作效率

较低。平均而言，美国员工每年要比欧元区员工多工作大约 40 天（图 4 左）。^② 假设欧美员工工作时间相同，且就业率和每小时生产率保持不变，欧元区人均实际 GDP 将比现在高出 21%^③。这一增幅将使目前欧美实际收入差距缩小约三分之二（图 4 右）。^④

由此可见，欧美之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同的偏好和制度安排，而非欧洲生产率低下。欧洲人选择更短的工作周、享受更长的假期、拥有更高的兼职就业率，这都是制度框架、社会规范与个人选择共同塑造的结果。

第二，欧洲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由于人均实际 GDP 统计的是不同地区、不同个人和不同部门的平均值，这意味着收入分配顶端的群体拥有极高的收入，会直接拉高整体的平均水平。自 1980 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在税后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攀升，目前达到 37%（Piketty et al., 2018），详见图 5 左。相比之下，欧元区这一比例平均仅为 27% 左右，显著低于美国。因此，美国大部分收入并非由占人口比重 90% 的普通民众所贡献，他们实际生活的人均 GDP 水平仅为 45 000 美元，而非统计数据中的 67 000 美元^⑤。此外，这种差异还源于收入增长日益向特定

- ① 虽然人均 GDP 仍然是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市场规模（实际 GDP）在评估全球参与者的议价能力时也很重要，意味着人口结构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 ② 此处假设工作日按八小时计算。2024 年，美国与欧元区人均年工作时长相差 315 小时。
- ③ 当前，与欧元区相比，美国（15 至 74 岁）人口中劳动力占比略高。数据显示，2025 年 12 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为 68%，而欧元区 2025 年第三季度为 66%。
- ④ 欧元区若以国民总收入而非 GDP 作为衡量标准，两者差距将进一步收窄，原因在于欧元区从其持有的海外资产中获得了大量收入。
- ⑤ 这些是 2024 年美国个人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及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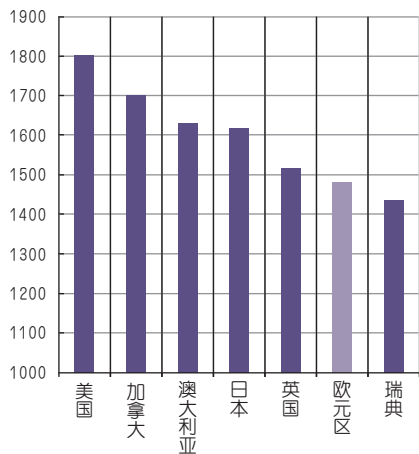


注：1. 以2021年的美元作为基准，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换算；2. 深色代表欧洲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和世界发展指标（WDI）。

图3 2024年人均实际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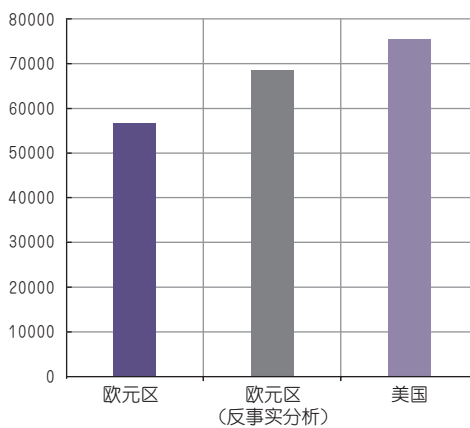
年人均工作时长



最新数据：2024年。

数据来源：世界经合组织（OECD）。

经工作时长调整后的人均实际GDP
(购买力平价；按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注：在保持生产率和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假设欧美雇员工作时长相同，欧元区实际人均GDP（以2021年美元不变价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图中绿柱所示。

最新数据：2024年。

数据来源：世界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

图4 年人均工作时长和经工作时长调整后的人均实际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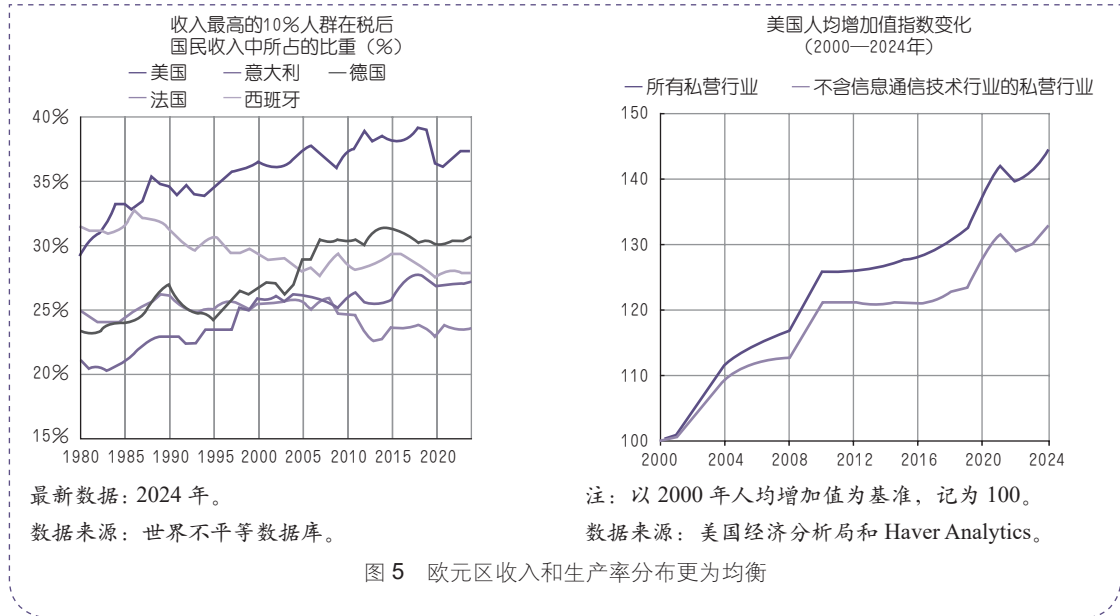


图 5 欧元区收入和生产率分布更为均衡

行业和特定地区集中的趋势。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比不到 2%（图 5 右），但自 2000 年以来，该行业对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却超过四分之一。

另外，美国人均 GDP 规模激增，主要得益于少数几个州的大型科技公司扩张，反观其余各州，增长表现则温和得多。事实上，美国各州人均实际 GDP 增长的中位数与欧元区各成员国增长的中位数大体相当，近年来甚至已落后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中位数水平（图 6）。

由此可见，单纯比较人均 GDP 会高估欧美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毕竟，欧洲人不仅工作时间更短，还享受着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更平等的社会环境。但若想维系这些优势，欧洲必须实现稳健增长。

第三，欧洲经济增长前景正因欧元区长期低迷的生产率而蒙上阴影。图 7 显示，过去 30 年，欧洲每小时产出的增长速度慢于多个可比经济体，反映出资本深化

不足、企业规模较小以及新技术扩散乏力（Schnabel, 2024）。

生产率增长的分化导致人均 GDP 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由于生产率增长是生活水平可持续改善的关键驱动力，缩小这一差距理所当然地成为欧洲的一项核心政策优先事项（Draghi, 2024）。

崛起的南欧：昔日欧债危机重灾区，今朝经济增长领头羊

在部分欧洲货币联盟地区，结构性改革的红利有目共睹。以南欧为例，10 年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饱受紧缩之苦且失业率高企的国家，如今已跃升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引擎（图 8 左）。

南欧国家吸引投资规模，刷新历史纪录（图 8 右）；失业率持续下降，降幅十分明显（图 9 左）。与德国相比，这些国家的融资条件正处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



注：以 2021 年的美元作为基准，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换算。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经济分析局和 Haver Analy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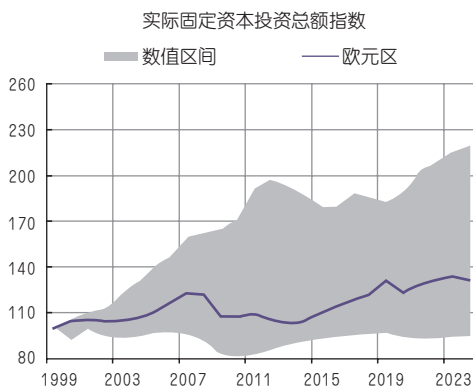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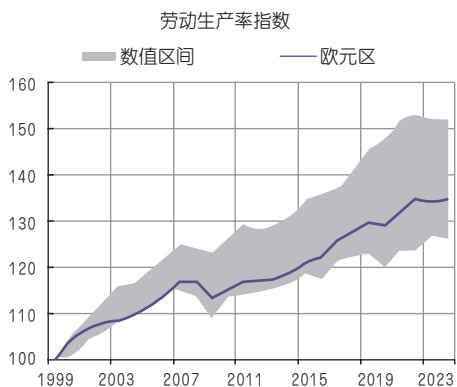
图 6 美欧人均实际 GDP 中位数变动比较 (1999—2024)

来的最佳状态，这无疑与经济趋同与金融一体化进程结出的硕果（图 9 右）。

其结果是，这些经济体得以在不影响复苏势头的前提下，腾出财政空间来削减赤字，进而推动了财政整顿进程，增强了债务的可持续性（图 10 左）。

可以说，南欧国家眼下的强劲表现，是其潜在经济能力持续向好的真实写照。欧盟委员会预测未来几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明显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图 10 右）。

例如，西班牙凭借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欧洲领先地位，成功压低批发电价，正逐步成为欧洲下一代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注：1. 数值区间包含的样本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和瑞典。2. 以 1999 年的数值为基准，记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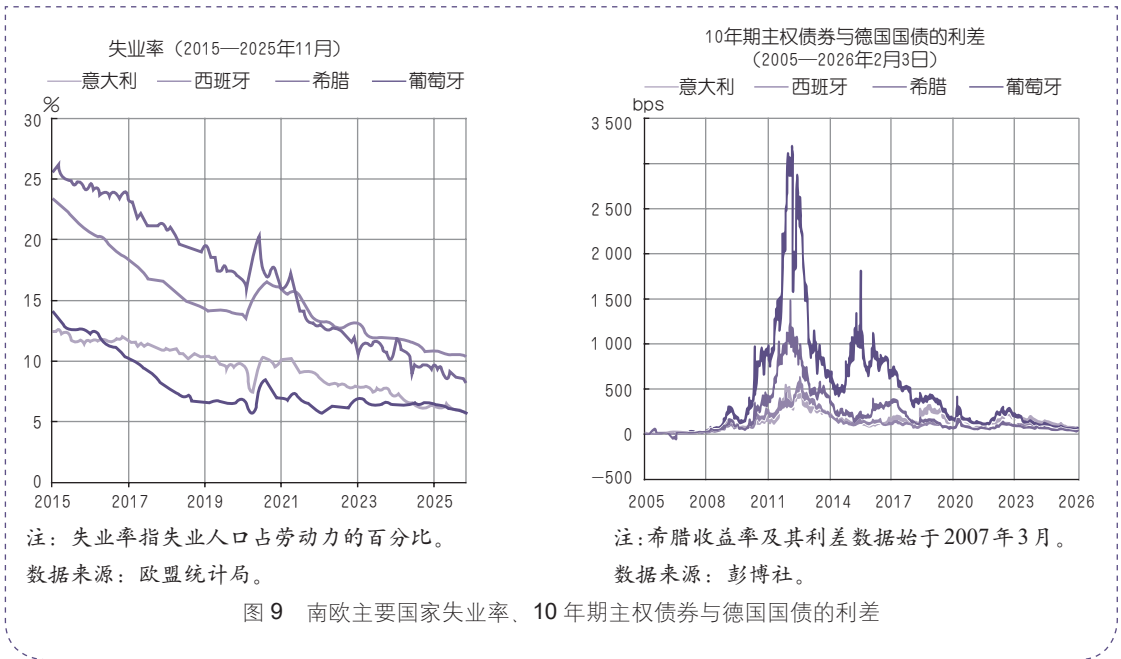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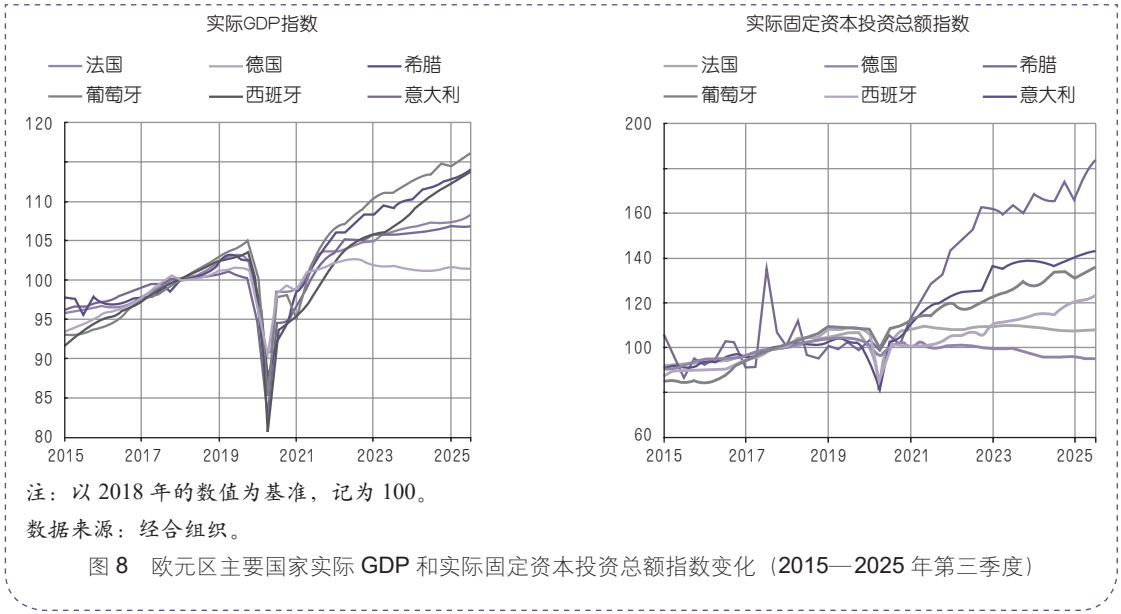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经合组织、国民账户和欧洲央行工作人员计算数据。

图 7 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固定资本投资总额指数变化 (1999—2024)

投资热土。^①又如，爱尔兰凭借其欧盟顶尖的理工科人才储备（自然科学、数学与

统计学领域的高学历人才比例居欧盟之首）以及全欧数一数二的营商便利度，成功吸

① 西班牙不仅吸引了诸多欧洲及全球云服务提供商在此设立数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还在电动汽车电池制造领域吸引了大量投资。



引了全球顶尖的科技、制药及生命科学公司在此汇聚落户。

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的蜕变是政治抉择和社会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得益于民众甘愿承受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阵痛，并能主动顺应随之而来的深刻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借助“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计划等政策工具，欧盟撬动了大量共同财政资源，精准支持那些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助力其扩大投资、加速改革并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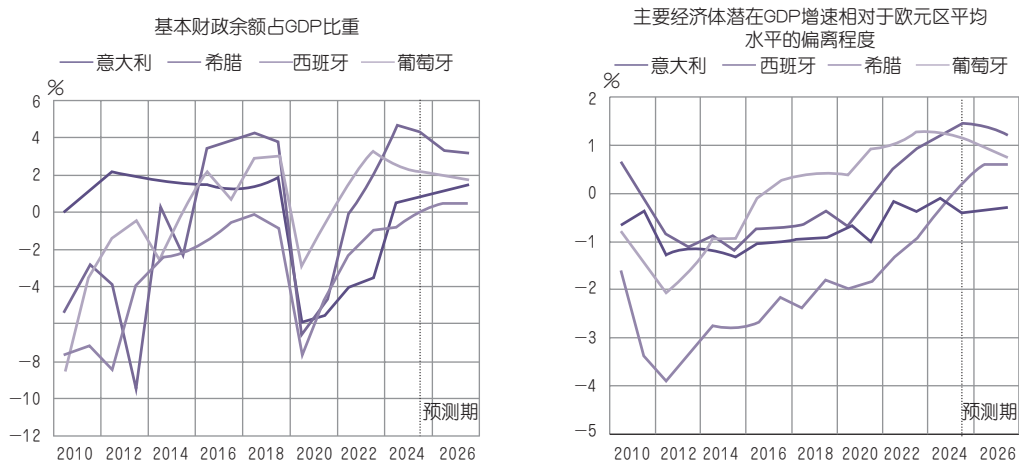


图 10 南欧主要国家财政及潜在经济增长表现变化（2010—2027）

升增长潜力，从而有效应对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见，笼统地给欧洲贴上“表现不佳”的标签，并不符合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现实。

停滞的德国：过往以出口导向模式称霸全球，如今在碎片化世界中步履蹒跚

当前，经济增长真正的阻力恰恰是那些传统的欧盟核心国家，只不过各自的症结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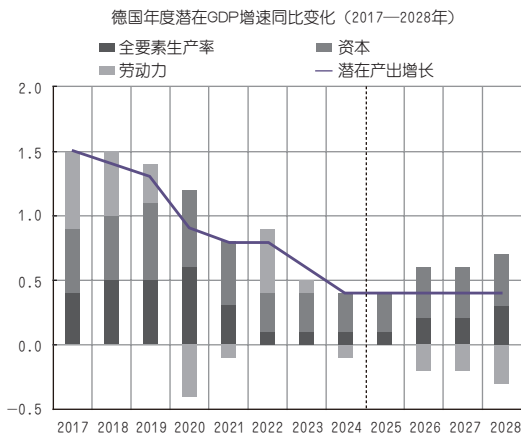
法国由于政治阻力，削减财政赤字的努力陷入停滞。未来财政整顿成效取决于能否在财政支出与增长政策间取得平衡，而这恰恰需要政治妥协来达成。北欧疫情后复苏之路同样坎坷，其中奥地利 2023—2024 年连续两年陷入衰退，2025 年仅温和增长。

然而，外界最多的目光还是聚焦于德国，该国经济增长长期陷入低迷，2019—2024 年人均实际 GDP 已累计下降 1.5%。德国经济正面临着多重挑战：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持续侵蚀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图 11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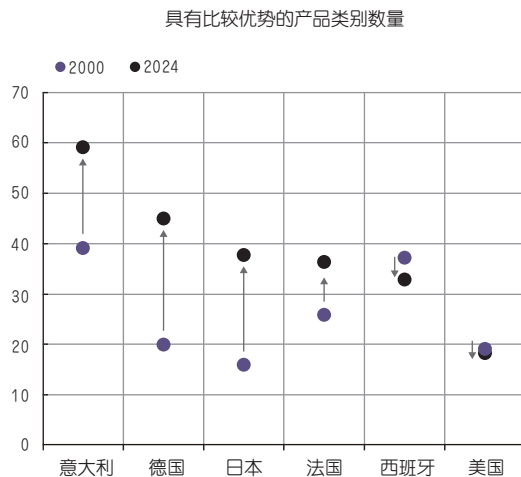
能源成本仍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保护主义的浪潮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崛起，对德国经济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图 11 右）。

由于出口增长放缓，德国经济疲软常被归因于其竞争力的下降。诚然，竞争力相对削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若将出口市场份额下降视为德国经济疲软的根源，则是一种“误诊”。如图 12 左所示，无论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德国的出口表现都未显著优于或落后于同类国家（Sandbu, 2025）。过去 10 年，德国的实际货物贸易出口状况基本与全球经济周期保持同步。

但德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并未转化为强劲的经济增长。1999—2019 年，德国 GDP 年均增速仅为 1.4%，低于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图 12 右）。因此，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外部需求的突然萎缩，也不在于德国自身竞争力的弱化，而是源于内需的长期低迷，导致德国经济面对外部冲击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脆弱，尤其是在全球日益碎片化的当下，传统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数据来源：欧元区体系工作人员预测（2025 年 12 月）。



注：比较优势指标定义为，一国某类产品出口在其总出口中的占比，相对于全球同类产品出口在全球总出口中占比的比值。若该比值超过 1，则表明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和欧洲央行工作人员计算数据。

最新数据：2024 年。

图 11 德国潜在 GDP 增长及出口比较优势的变化

自 1999 年以来，德国实际私人消费年均增速不足 1%，远低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如图 13 所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21 世纪初实施的改革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实际工资的上涨，导致劳动收入占比

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和储蓄比重相应提升，最终体现为德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急剧攀升（Klug et al., 2021；Wolff, 2018）。

国内投资持续疲软，使得大量国民储蓄不得不“出海”寻求回报，变相为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支持。

回溯过去 20 年，倘若德国国家与企业能够释放更多消费与投资需求，其贸易顺差规模本应有所收窄，GDP 则可能呈现出更为强劲和均衡的态势。然而现实是，即便在当前环境下，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依然显著高于其经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水平。按照欧盟委员会测算，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预期仅应占其 GDP 的 1.2% 左右，这一数字仅为当前实际水平的零头（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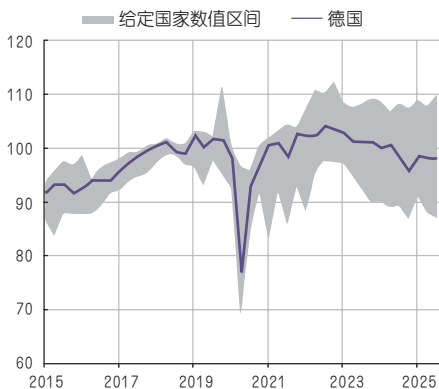
适宜的财政支出和结构性改革，可以释放潜在经济增长新动能

当前，德国正着手解决其宏观经济失衡与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主要宏观政策工具之一。正在推进的财政刺激方案，规模堪称二战以来之最，标志着德国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以及提高德国国防能力的措施，不仅支撑了国内需求，还增强了经济供给能力，为经济摆脱停滞奠定了基础。倘若更多的公共支出能够合理分配，并辅以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将提升潜在增长率并带动国内的私人投资，这对德国而言尤为重要。因为，面对能源成本上升与过度官僚主义的双重压力时，德国企业历来倾向于通过扩大海外生产来规避风险，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头寸强劲增长，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证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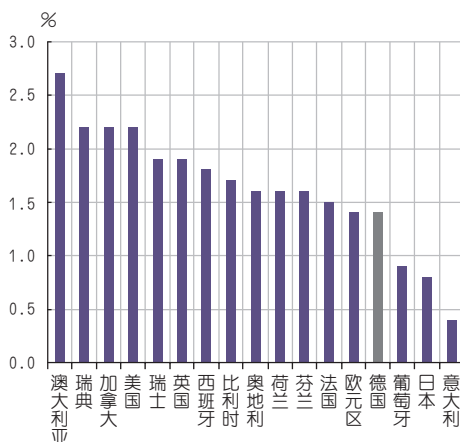


实际货物贸易出口指数（2015—2025年第三季度）



注：1. 给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2. 以2018年的数值为基准，记为100。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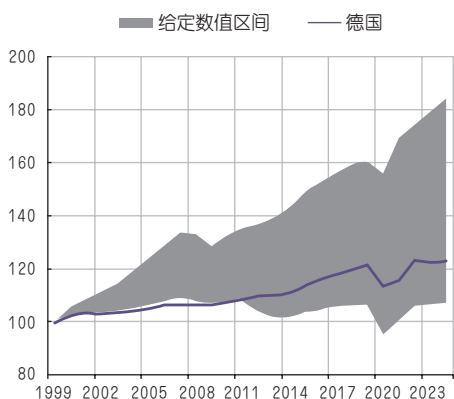
实际GDP年均增速（1999—2019年）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OECD）、Haver数据库和欧洲央行计算数据。

图 12 部分发达经济体实际货物贸易出口及实际 GDP 增速比较

实际私人消费指数（1999—2024年）



注：1. 数值区间包含的国家为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和瑞典。2. 以1999年的数值为基准，记为100。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和欧洲央行工作人员计算数据。

德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1999—2025年11月）



注：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德国深度评估报告》中计算了德国的经常账户均衡值（图中以黑色虚线表示）。
数据来源：Haver 和欧盟委员会《2025年德国深度评估报告》。

图 13 德国实际私人消费及经常账户变动

14左)。换言之，德国的国内投资缺口并非源于企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创意，而是一种配置上的选择，德国强大的工业技术底蕴犹在，但其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

德国的“隐形冠军”，即在全球细分

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专精特新企业至今仍在不断开拓创新。图 14 右显示，全球近半数的“隐形冠军”依然位于德国，数量比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加起来还要多（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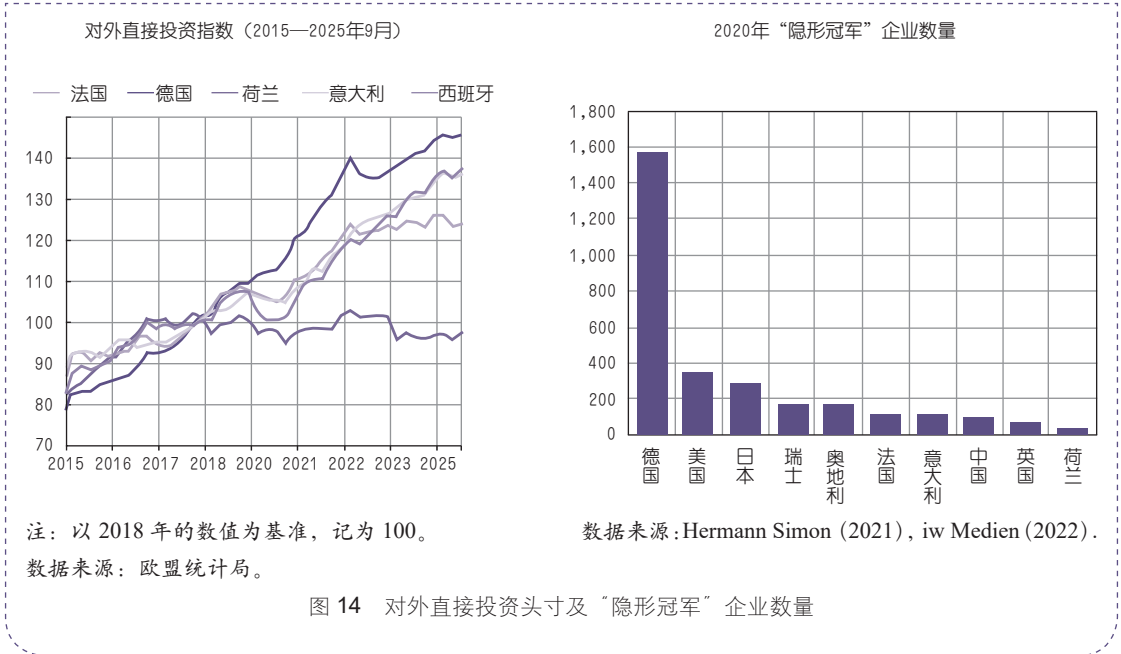


图 14 对外直接投资头寸及“隐形冠军”企业数量

凭借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和富有勇气的投资倡议，德国有能力将更多的私人资本、创新成果与增长动能留存在国内。加之稳健的财政状况，德国完全有能力承受这一支出，尤其是如果这些措施有助于扭转潜在增长率的下行趋势，那么额外的支出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德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并对欧洲其他地区带来正面的外溢效应。

欧洲缺乏的是规模，而非创意：以“第 28 个制度”为例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观点：虽然欧洲面临的挑战不小，但欧洲有能力和办法克服困难，前景应是乐观的。欧洲拥有巨大的人才储备、创新思路和科研成果。如图 15 所示，从绝对数值上看，欧盟在主要学科领域的论文发表量都超过美国，与中国不相上下 (Elsevier, 2025)。此外，欧洲每年诞生的初创企业数量也比美国要多。

欧洲也并未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败”。历史证明，过往通用技术带来的

生产率提升，主要并不来自技术发明本身，而在于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普及应用 (Aldasoro et al., 2026 ; Comin & Hobijn, 2010)。在制造业、能源、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重要领域，欧洲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来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巨大。

事实上，21 世纪初欧美生产率差距之所以扩大，并非因为欧洲停止了创新，而是因为其未能及时普及信息通信技术 (Schnabel, 2024a)。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通信技术投资需要付出高昂的固定成本和组织成本，而美国公司由于身处大规模、一体化的市场，可以通过更广阔的客户基础来分摊这些成本。美国超过 250 名员工的企业创造了约 60% 的就业岗位，反观大多数欧元区国家，这一比例仅为 20% 左右。换句话说，欧洲的问题是缺乏规模 (Schnabel, 2024b)。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监管与行政壁垒仍在阻碍单一市场内商品与服务自由流动。据估计，这些内部壁垒相当于对服务贸易征收 96% 的关税，对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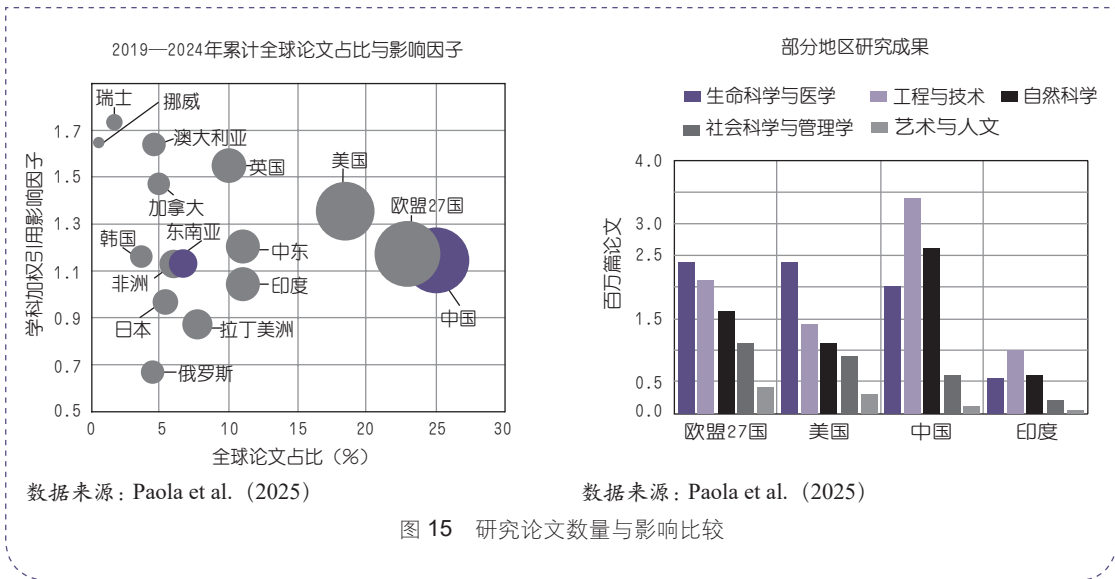


图 15 研究论文数量与影响比较

贸易征收67%的关税(图16)。^①食品生产、建筑等一些行业面临的障碍则更为严峻。

其结果是,尽管服务贸易占欧盟总增加值近四分之三,但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规模,并未超过其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规模。

目前,关于减少这些内部壁垒的提案已有不少,内容涉及深化资本市场一体化,以及建设欧洲共同的能源、国防和数字基础设施等(Draghi, 2024)。最具影响力的提议是创建“第28个制度”,即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面向各种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开放。

几十年来,单一市场主要是通过协调27个成员国的体系得以构建。这种方法在许多领域成效显著,但在某些领域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当欧盟指令被转化为成员国法律法规时,成员国出于自身考量层层加码的现象,如今已是屡见不鲜。

时至今日,企业创始人仍不得不周旋于由错综复杂的法律制度、公司法规和监管体

制拼凑而成的迷宫之中。这种碎片化格局如同一道无形的内部关税壁垒,使得企业跨国扩张成本高昂且困难重重,特别是进入较小国家时更为明显。最终的结果便是阻碍了企业成长,并最终拖慢了创新的步伐。

大多数欧洲企业仍然规模太小,而初创企业往往在开始成长时就选择成为美国企业。大量欧洲初创公司在美国未开展实质性业务之前,就注册为特拉华州公司,而非依据欧洲法律注册。正因如此,美国的许多独角兽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其实是欧洲人。

这种现象绝非巧合。特拉华州注册一家公司仅需数日,甚至数小时即可完成,且成本极低。此外,该地区法律框架标准化程度高、可预测性强,全球投资者能即刻理解并接受。反观欧洲,要实现跨境规模化扩张,企业仍需逐个国家重新适应其法律体系,加之烦琐昂贵的公证程序以及各自为政的公司登记系统,导致成本高昂。

① 虽然这些估计值应被视为现有壁垒的上限,但同时也表明,单一市场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开发(Lagarde, 2025; Bernasconi et al., 2025; Alfred,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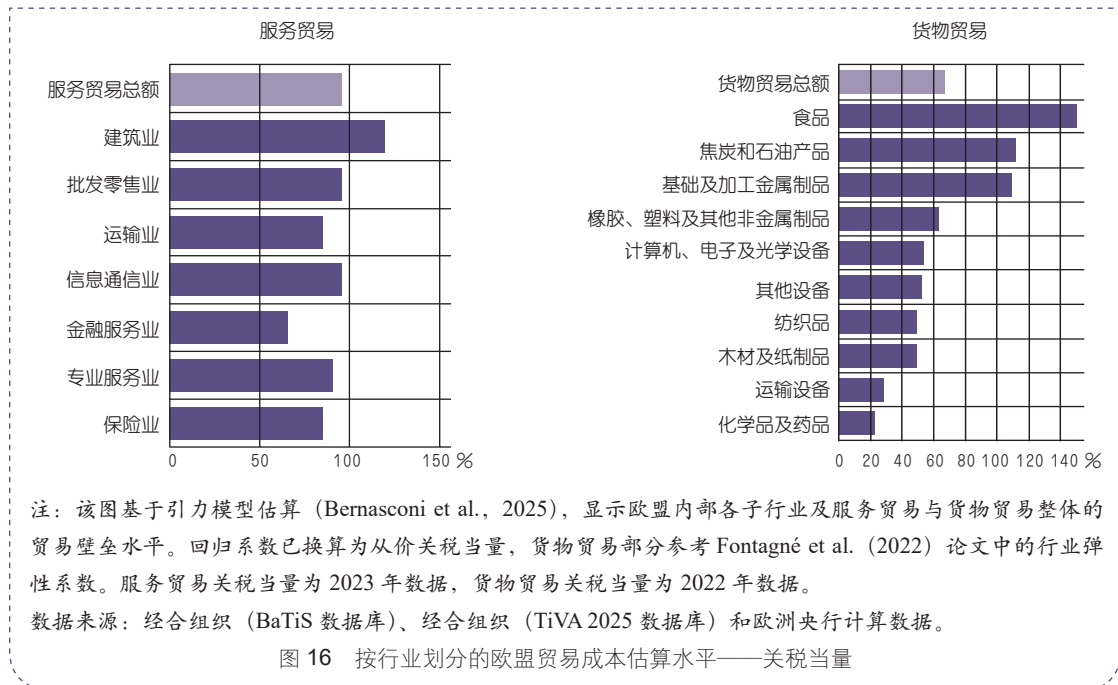


图 16 按行业划分的欧盟贸易成本估算水平——关税当量

此外，尽管欧洲在初创阶段的资金相对充裕，但在成长和退出阶段获取融资要困难得多。因市场缺乏流动性，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定价往往不具吸引力，导致欧洲新兴企业不得不转向外部寻求融资。造成的结果是，尽管欧洲擅长孕育创意和创建初创企业，却难以在成长壮大之际将其留在欧洲本土。

“第 28 个制度”：如何助力促进创新和提升生产率

“第 28 个制度”可以改变这一窘境 (Letta, 2024)。依据“第 28 个制度”，企业可以选择注册为一家真正根植于欧洲的公司，相当于打造一个“欧洲版的股份公司” (EU-Inc, 2025)。

此类公司将遵循一套统一的规则，涵盖公司法、治理架构、股东权利、员工财务报酬等方面；公司注册过程具备快捷、低廉、

全数字化的特点。该制度采取自愿参与原则，面向所有规模、所有行业的企业开放。

这种开放性至关重要。未来哪些技术、企业或行业能带动欧洲经济增长，我们既无法预判，也无须预判。若将这一制度仅限于初创企业，反而会适得其反，违背帮助企业成长壮大取得成功的初衷。

该制度通过为企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公司框架，将有效降低跨境经营壁垒，便利企业融资与人才引进，并使创新型公司能够在欧盟范围内更快实现规模化发展。

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律落地实施至关重要。“第 28 个制度”落地的最佳路径是制定欧盟条例，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否则，欧洲最终可能会面临 27 种不同版本的“第 28 个制度”，从而重蹈碎片化局面。^①此外，“第 28 个制度”是对各国现有制度的补充，而不

① 一种选择是直接将条例作为欧盟成员国法律的一部分，无须经过转化程序。另一种选择是采用最高标准协调指令，它固定了整个规则手册，不允许在转化过程中出现任何偏离。



是替代。该制度并非要统一劳动力市场或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事务仍由各成员国自主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第28个制度”也不是为统一税收打开后门，公司税率、税基以及财政政策的其他方面，仍将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①该制度的目标更为聚焦，旨在为希望跨境扩张的企业消除不必要的法律碎片化与不确定性，增强欧洲公司对全球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及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达到与当今特拉华州公司相当的水平。

因此，“第28个制度”有助于确保下一代欧洲企业始终植根欧洲，创意在此萌发，价值更在此缔造。这将有助于促进创新，并最终提高生产率——这一直是欧洲的软肋。在人口老龄化与全球碎片化的背景下，重振生产率对于持续繁荣至关重要。

结论

总之，欧洲大陆，潜力无限。尽管挑战

重重，欧洲依然是全球最繁荣、最具创新力、社会最凝聚的地区之一。这里的生活质量位居前列，科研成果卓越，环境保护标准全球领先。欧洲人不仅靠条约和法规，更靠共同的价值观——多边合作和恪守法治精神联系在一起。这让欧洲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活、工作与投资目的地之一，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和企业提供稳定、可预测的环境和机遇。

欧洲的核心挑战并不是缺少创意或人才，而是规模不够。欧洲完全有能力靠自己改变现状。“第28个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具体而有力的路径，这一框架能够让创新得以蓬勃发展，企业得以扩张规模，生产率得以提升。

通过助力构建一个真正无摩擦的单一市场，该制度能够为企业树立起“欧洲制造”的品牌形象，代表着创新、卓越与法律确定性，而这正是欧洲需要重新掌握的话语权。^② **[N]**

学术编辑：张毓

From Barriers to Engine: The '28th Regime' and the Future of 'Made in Europe'

Isabel Schnabel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ECB)

Abstract Europe is often labeled as "stagnant," yet it enjoys robust institutions, strong social safety nets, and world leading quality of life. The core challenge it faces today is not a shortage of talent or ideas, but a lack of scale. The single market remains fragmented by regulatory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making cross-border expansion difficult and causing innovative firms to leave. Sou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staged strong recoveries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s, while Germany has been trapped in stagnation due to persistently weak domestic demand and capital outflow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proposed "28th regime" would create a voluntary, unified EU-wide legal framework for companies, reducing cross-border costs and facilitating access to finance and scaling. If implemented, it could unlock the single market's full potential, foster a "Made in Europe" brand, and boost productivity. In turn it would strengthen Europe's competitiveness and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global economy.

Keywords European Economy, Single Market, 28th Regime

JEL Classification F15 O52 L51

① 假以时日，若在政治上可行，该制度可在多个维度上进行扩展。例如，研究表明，对颠覆性及高风险技术的投资，不仅对预期收益极为敏感，对失败代价也同样如此。因而，考虑到科技初创企业通常聘用的是高学历、高薪员工，有针对性地为高收入群体放宽裁员规定或许有其合理性 (Coatanlem & Coste, 2024)。

② 参考文献[1]~[23]，见增强出版，中国知网—《金融市场研究》。